

房山县解放初期的农村小学

张广文

1948年12月14日，房山县解放。1949年2月，我开始上学，那时已经8岁了。结合有关史料，回忆1949年2月到1953年6月那段艰苦而又充满激情的小学时代，对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农村小学教育情况也可见一斑。

校舍 老师 学生

房山解放初期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教育工作。1949年2月，县文教科在顾册村举办教师训练班，县长、县委书记亲临讲课，仅仅解放3个月就实现了村村开学。不过，农村的小学都是初级小学，上一至四年级，五年级、六年级是高级小学，要通过考试录取。高小设在县城和大的村镇，解放时，全县仅有十余所高级小学。

说是开学，其实就是背一个手工缝制的布包让父母带着去学校。除了有些大村子办过学校或高小有校舍外，绝大部分解放后建校开学的都是在村里的大庙或祠堂里，都是公产，院子大，房子多。我上学的饶乐府村小学设在村子中间的老爷庙。庙是两进的院子，前后各有东西配殿，后院的东配殿就是学校的第一间教室了。现在的小学生很难想象当时的“教室”：残破的门窗四处漏风，一块块脱落的墙皮下露着砖石，屋内空空。村民临时推举的校长叫邱凯，高高的个子，说话还有些结巴，告诉家长让学生下次来时带窗户纸糊窗户，还要自带桌椅板凳上课用。第二次上学时很热闹，有拿纸的，有拿浆糊的，在老师的指挥下糊窗户。桌椅更是五花八门，有人拿的是小板凳，有的是能坐三四人的长板凳，有的把太师椅拿来了。不知是谁的家长搬来两张大方桌，还有一个破炕桌。冬天还没有过去，屋里也没有火炉，上课就那么干冻着，手冷了用嘴哈一哈，脚冷了就跺跺脚。直到第二年冬天，才有了像样的桌椅，才用土坯砌了一个火炉。

教室旁边的大殿里，佛像还不时享用香火，叩头烧香的和读书上课的同在一个院，加上一些人的迷信传说，让我们这些孩子终日有一种阴森森、惶恐不安的感觉。下课了谁也不敢在学校呆，赶紧跑回家才踏实。直到1950年政府提倡破除迷信，才把这些佛像推倒请出来，前殿后殿和偏殿都改成了教室。只不过大殿都是一面有门窗，窗户又是糊纸御寒，冬天阴天时，屋内只能看见同桌同学的脸，看不见黑板，老师没法板书，只能对学生口传心授。后来，结合语文开了一门“说话”课，让学生通过猜谜语、讲故事练口才。因为是轮流说话，一

个也不能少，学生只好在校外学一些东西拿到课堂上说，对有的低俗的“谜语”并不十分理解，也拿到课堂上说，弄得老师哭笑不得。讲故事也是五花八门，实在讲不出来还可以学猫狗叫，学鸟叫。

房山刚解放，一下子开办那么多学校，师资成了大问题。虽然立即开始举办师资短训班，但远水解不了近渴，各学校就自己想办法请老师先开课。我的启蒙老师姓陈，四十多岁，丁家洼村人，上过私塾。刚见到他时，头戴一顶圆毡帽，身穿黑色棉裤扎裤腿，脚穿双鞍棉鞋白袜，干净利落，透着一股老学究的味道。陈老师毛笔字写得很好，教我念书时是有腔有调的“唱书”，当时只有一个老师一门课。陈老师只教我们不到一个学期，一位 1948 年毕业于房山中学的贾童文老师（琉璃河李庄村人）就从县里正式分配来了。1951 年又来了初师毕业的梁月华老师。随着班级地增加，陆续分配来了其他老师，学校教学也逐步走上正轨。

农村小学老师生活条件异常艰苦。住的是黑漆漆的破庙，拿的是小米工资，每天自己筹粮买菜生火做饭，还要在煤油灯下备课，直到 1952 年 9 月才开始发工资。好多学生和家长对老师都是很尊敬的，一到农历的节日，都让学生把家里做的节日食品给老师送一些去，有的还请老师到家里吃顿饭。不少家长和学生也和老师结下深厚的友谊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那时老师教学生是沿习了旧教学方法，对学生是有体罚的。学习成绩不好，违反纪律都要罚。轻的罚站，有的上课在课堂上说话，打盹，就在课堂里罚站；打架，就到教室外面罚站。时间一节课甚至半天。

1952 年，教育部门在教师中开展了纠正体罚与变相体罚的运动，消除残存的私塾式念、背、打教法，让学生也有了自己的尊严。

饶乐府小学刚开学时，说是一个班学生，其实只有 20 多人。年龄从六岁到十一二岁都有。后来，有的成绩跟不上退学了，有的要回家跟大人干活退学了，也不断随时有人插班入学，一个班到底有多少学生没一个准数。

1949 年下半年解放区完成土地改革后，人民从经济上得到翻身解放。政府适应广大群众从文化上翻身的迫切要求，放宽年龄限制，凡有上学条件的都可以上学。教室的后面又增加了十多名十五六到十八九岁的大哥哥大姐姐上课，有的比老师年龄还大。当时特别提倡妇女解放，因此主要是大龄女青年。虽然由于各种原因，这些超龄学生多数都没有初小毕业，但他们再也不是文盲了。

课本 课程 文具

学校刚开学时，既无课程安排，也无课本可读，陈老师只好教我们念百家姓、三字经，其余就是写毛笔字，老师教了笔画以后就照字帖写字，主要是柳公权、颜真卿的字帖。

过了几个月，算是有了课本，叫新三字经，是解放区编的。现在还记得开篇几句是“中国人、四万万、有好人、有坏蛋。”直到二年级时才有了正式的课本。

课本内容很实际，记得第一课是“一个人”，第二课是“一个人有两只手，左手和右手”。还有教育学生拥军优属的内容：“一二三、一二三，一走走到宋家滩，宋家滩有个宋大娘，儿子打仗在前方。”只是课本质量太差太差了。是用类似于窗户纸的毛头纸印刷的，像现在的无纺布，但薄厚不匀。有的两面的字都看得见，有的是一个大洞没印上字。算术课还包括珠算，从乘法口诀小九九练起，只学了一年就能帮家里算账了。

1949年6月，华北行政委员会就召开了华北小学教育会议，制订了《小学教育暂行实施办法》、《小学教师暂行服务规程》，对教师、教材、课程等都做出安排。到三年级时，课本就正规了，而且有语文、算术两种课本。但是那时压倒一切的是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，教育部门心有余而力不足。课程虽然安排了语文、算术、体育、音乐、美工五门课，实际上只能是有什么老师开什么课，老师会什么教什么。直到我毕业那年，体育、音乐、美工课都是语文算术老师代教的。三年级时学校在大庙北边的菜地里开出一片两三亩地的操场，有了跑步、体操、跳高、跳远等正式的体育活动。音乐课开始学简谱。美工是图画课和手工劳作两个内容。语文课还包括写毛笔大楷和用小楷写作文，都是自带砚台自己研墨。记得在《我的理想》一篇作文中，我写的是长大要当工程师。谁知当初为了这个朦胧的理想我奋斗了整整30年才得以实现。

由于解放初期物资匮乏，家里又没钱，上学所用的文具是现在的小学生无法想象的。课本费必须得交，但有的家长实在拿不出钱，就把家里的粮食背到学校，让老师帮助想办法。作业本都是自己买纸裁好自己装订，那时又没有订书机，都是用针线缝的本子。薄的、厚的、黑的、白的还有捡来的彩色纸，五花八门。一二年级时作业只用铅笔，铅笔质量很差，经常把纸划破，遇到那种颜色浅写不出字的铅笔，只好蘸一次唾沫写几个字，写完作业，嘴唇都是黑的。即使这样的纸笔，也不是都买得起，大部分学生都是从家里拿几个鸡蛋去村里的小店换来的。

为了省铅笔，都要准备笔帽，一方面是保护削好的铅不断掉，一方面是把笔杆接长，直到笔杆实在套不住了才换笔。那时，铅笔只剩下不到半寸长了，还得把铅剥出来捏在手里用。平时练字和演算题用的是石板和石笔。房山区出一种青石板，切割成十六开纸大小，磨平，装上一个木框，用一种较软的石头做成比铅笔细一些的石条做成石笔，在石板上写字，写完可以擦掉再写。一堂课下来，老师要来回走好多趟。学生的桌面上、衣袖上甚至脸上都是石头末。至于用钢笔，那是三年级以后才有的事。小学生尤其是初小学生是用不起自来水笔的，又要写钢笔字，怎么办？都用蘸水钢笔，这种笔一直用到上世纪90年代初。蘸水钢笔，必须配有墨水瓶，蘸一下写几个字，买瓶装墨水好用，但是花钱多，于是就想各种办法代替。有的直接用墨汁，因为不流畅，写的字深一块、浅一块的，还经常断笔画。有的买颜料自制墨水，这有两种。一种是文具店卖的专用的固体颜料，用热水冲开灌到瓶中使用；一种是杂货店卖的染衣服用的染料，也可以冲成墨水用，比较便宜，但颜色浅，沉淀多。这两种自制的

墨水不但写字深浅不一，而且有紫色到蓝色各种颜色，也没办法要求统一。

课外活动

解放后的小学生活实际上是从课外活动开始的。没有书本先有活动。房山解放时正是平津战役北平围城，各路大军调动频繁，几乎每天都过部队，村里组织欢迎，学生都要参加，手拿彩色三角旗上写着欢迎词，站在路边喊欢迎口号。

刚上学时没有音乐课，却学会不少歌曲，多是跟解放军学的。最早学的就是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，哪个部队都唱，我们就跟着学，没谱没词，也不太懂歌词的含义，只是听声音。因此闹出了“革命军人个个要老鸡”的笑话。其次就是《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》、《团结就是力量》、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、《东方红》等歌曲，每次开会必唱。

学生们要参加各种各样大会，一方面受教育，一方面壮声势。庆祝“五一”劳动节、国庆节都要到县城的城隍庙广场。其中，最受教育的是枪毙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的公判大会。第一次是枪毙曾杀死过几十名八路军的恶霸反革命杨天沛，后来还有国民党县长保安团长张德祥。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高潮时期一次就枪毙了27个血债累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。每次枪毙前都要把犯人押到城隍庙戏台上，让受害人或家属当场控诉他们的罪行，最后是政府宣判，宣判后就由解放军和民兵把犯人推到西门外或东门外的沙滩上枪毙。那些上台控诉的人，个个苦大仇深，家里都有被反革命残害的人，控诉时台上台下哭成一片，仇恨至极，有人哭得昏倒在台上。到这时，全场人都站起来义愤填膺地高呼口号。通过参加这些活动，对没有共产党但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逐渐有了深刻的理解。

1950年底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，志愿军战歌响彻祖国大地。刚经过土改分得土地的农村很快就懂得了保家卫国的深刻含义，全力投入抗美援朝的运动。学生也不例外，主要是由学校组织宣传活动，写黑板报，刷标语，写标语，游行示威，街头演讲，入户宣传，屋顶广播，欢送青年入伍，写慰问信，做慰问袋。还要利用星期天慰劳军属，帮军属家挑水扫院劈柴。在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中，家里拿不出钱来，就利用课余时间到处捡废铜烂铁，甚至到齐家坡原来国民党修的碉堡战壕捡子弹壳，炮弹皮，交给学校卖了钱，再捐献出去。当听说捐献的飞机有一架是“少年儿童号”以后，我们都为此而骄傲，也为志愿军叔叔取得的胜利而欢欣鼓舞。那种爱祖国爱人民的信念，也逐渐深深地扎根到幼小的心灵里。

学生参加诸多政治活动，经常停课，虽然受到很多实践的教育，但也打乱了教学安排。另外，学校和村公所放在一起，开会办事人来人往，晚上有扫盲的识字班上课，也有村剧团排演节目，老师也无法安心备课。这种现象全国都一样，教育部门只好向上级反映，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，政务院就发布了《关

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》的指示。从 1952 年开始，县里分期分批开展克服学校中内外混乱现象，明确提出“教学工作是学校中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”，才逐步建立了正常教学秩序。

解放初期的农村小学每个学年结束并没有成绩通知单，而是由老师把年终语文，算术的考试成绩汇总后，以分数多少排出名次张榜公布在学校的墙上。90 分以上的为“甲等”，75 至 89 分的为“乙等”，60 至 74 分的为“丙等”，不及格的为“丁等”。记得一二年级时，“甲等”第一都是原来家境较好，家长又识字的学生。我暗下决心，努力学习，终于在三年级时上了“甲等”第一名。由于这种张榜公布的方法有损学生的自尊心，不利学生成长，1952 年以后就取消了。

学制改革

解放初期，农村小学沿用春季开学（实际是春节后开学），冬季结业（实际是年末）的学制。寒假和县城小学一样，而数伏天还得上学，没有暑假，只有麦秋假和大秋假，目的是回家帮家长种地收秋。我们非常羡慕城里的学生，夏天最热时可以在家里玩。1952 年，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颁发《四二制小学暂行教育计划》，规定每年 9 月 1 日至次年 7 月 31 日为一学年，每年安排暑假寒假各一个月，农村小学生才享受了城里学生同等待遇。

学制一改，问题来了。我们四年级 1952 年年底毕业，高小夏季才招生，半年时间怎么打发？于是采取了一个过渡办法。春节开学后，原来的课程继续上，课本继续用，老师讲得深一点，作业布置多一点，叫四年级不合适，取名“四补”，有条件升高小的就补，没条件的就初小毕业回家了。一直补到 1953 年 6 月，报名去考县城完小。当时县城的小学 and 中学混杂在房山城内东南角的孔庙和文昌宫里。我的考场就在文昌宫一个改建的教室里。我轻松地答完考卷，美美地享受了第一个暑假生活后，就接到录取通知书，从此结束了初小生活，成为房山县城关完全小学的一名高小学生了。